

A CLOSE LOOK AT FUNDAMENTAL
ISSUES OF PHILOSOPHY

对哲学基本问题 的深度审视

陈名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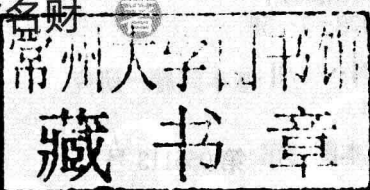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A CLOSE LOOK AT FUNDAMENTAL
ISSUES OF PHILOSOPHY

对哲学基本问题 的深度审视

陈名财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邹 蕾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朱 洁
封面设计:远近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度审视 / 陈名财.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14-5738-2

I. ①对… II. ①陈… III. ①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IV. ①B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5113 号

书名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度审视

著	者	陈名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738-2
印	刷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1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导论 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	001
一、选题的由来	001
二、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	005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浅识	019

第一章 回到哲学基本问题

一、追问哲学基本问题的合法性	034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成果	054
三、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文本梳理	064

第二章 精神与存在的关系

一、是“精神与存在”还是“思维与存在”	073
---------------------------	-----

二、准确理解“精神”的内涵	085
三、恩格斯没有把“存在”等同于“物质”	100
四、西方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111
五、精神与存在关系的问题域	125
第三章 精神与存在的统一性	141
一、为何表述为统一性问题	142
二、世界的本原问题	145
三、重新理解恩格斯的世界统一性问题	179
四、东西方对统一性问题的不同致思方式	198
第四章 精神与存在的同一性	206
一、是精神还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206
二、从真理的不同种类看精神与存在的同一	218
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226
四、认识的路线问题	246
五、思维方式问题	253
六、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264
第五章 精神对存在的超越性	289
一、意义问题是哲学的皈依	290
二、人类的超越	300
三、个体的超越	313
四、重思道德金规则	326
主要参考文献	338

导 论

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选题的由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的意识;在新世纪的黎明中,这种意识更清晰地表现为融入“世界问题域”的自觉。于是绕不开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新的学术规范和理论生长点的根基和源泉何在?应当从何处吸取营养,前进的方向何在?中华思想在新世纪的地位和作用何在?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种新的哲学和文化的突破,还是植根儒家传统,面对现代人的生存条件提出有哲学意义的洞见?等等。

整个中国学术界的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在哲学领域主要表现为如下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如何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和如何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实际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因为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因此,如果希望自己的哲学研究能在较深层次上,对当下的中国哲学理论有所推动,就应当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在这一问题域中找到自己研究的位置。显然,在此笔者不可能正面回答如此巨大的问题,更不可能对此问题给出圆满的回答。要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整个中国哲学界一代、甚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此,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使本课题研究有一个理论背景的引导。

因此,这种在“中、西、马”的融合中对研究位置的寻找,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什么“典型的非专业性的闲谈”。近几年,中国哲学界流行一句话,“融合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句话显然是很不确切的。此处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融合、贯通的问题。“中、西、马”的融合不是只有在对“中、西、马”哲学中的所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以后才能进行。我们用其中两家的某一思想去解读另外一家,这也是一种融合;把“中、西、马”中任何两家的某种观点、某些著作和作者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种融合。甚至,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无意识地包含着一种视界融合。因为,任何解读都是一种理解,任何理解都包含着潜理解,不同生活境遇必然使中国人在解读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着自己特殊的潜理解,以这种潜理解为基础的解读,必然是一种视界融合的结果。当下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也是一种视界融合,现代中国人毕竟不同于中国古人,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也就必然包含着不同于古人的潜理解。所以,如果说绝对意义的“中、西、马”融合是不可能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融合中西马,吹破古今牛”),那相对意义的“中、西、马”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时常在发生着的。就像《功夫熊猫》,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的,但《功夫熊猫》却是好莱坞片子一样。两种文化的融合不是像两瓶不同液体的融合,需要把它们倒在一起,搅拌、震荡,让它们充

分融合。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融合,常常采取的是吸收该文化中的一些元素,来丰富自己。就像现在中国人穿衣服一样,完全可以同时包含一些传统元素和西方文化的元素。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精髓代表,发生的融合也是这样,只要是稍有见识的研究“中、西、马”的学人,都不可能不对其他两家的部分学说、思想有所了解,其他两家的一些哲学观点、思考方法都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研究产生影响。所以,不管你是否承认,“中、西、马”的融合实际上时时在发生,只是很多时候这种融合是不自觉的,是没有经过反思的。这样说来,我们对这种融合进行反思,并力图在研究开始之前有一个方向,就不能说是一种“宏大叙事”。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可以表述为,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化”话语的合法化的叙事。在麦吉尔认为,“宏大叙事”这个术语最好被看做是指代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罗斯认为,由于“宏大叙事”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可见,史学中的“宏大叙事”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存在一种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的内涵,因此,史学“宏大叙事”往往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可见,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形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因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于是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宏大叙事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这种历史构想是史学家的希望和寄托,激励着史学家不断追求人类社会发 展之谜,尽管这种构想很

多时候被历史事实证伪,但它的确是引导人类前行的灯塔,没有这种历史的构想,人类的行动将失去方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回顾近代以来,共产主义是如何给中国人民灌注希望,如何引导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历史,来很好地加以说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宏大叙事,要批评的是以绝对理性为指导的宏大叙事。

利奥塔之所以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他认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显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但利奥塔在拒斥宏观理论时必然会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指责总体性、宏大叙事、共识及普遍性等。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没有像丹尼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流活动理论,又抵牾弗莱德里克·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印合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从语言资质(compete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手,试图以语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变异和危机症状。他深入论证了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原话语(metadiscours)的衰败销蚀,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面,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放变动“语言游戏”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矛盾。利奥塔这一观点的意义自不待言,它提醒人们在面对总体化时应注意差异的根本重要性,也鼓励人们站在差异的一边行动,而反对普遍标准和价值的不公正运用。但这一理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在哲学上,反对宏大叙事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精神根基,它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从毕达哥拉斯直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时候,曾多次指出形

而上学是西方思维的“命运”或“宿命”。20世纪总体上是一个拒斥形而上学而强调分析实证的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已成为明日黄花,形而上学对20世纪而言依然是必不可少,甚至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西方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自己彻底清除了,可是他们却又常常被后起的哲学家宣称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当厌弃了形而上学的人们沉醉于学科与专业的分化,沉醉于实证性和效用性时,人类的知识状况日益支离破碎。因此,新的世纪迫切需要一种令人确信的综合性洞察力,一种能够把许多知识碎片整合成为一个普遍而连贯的统一体的思想方式。对当今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的时代迫切呼唤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需这种综合性洞察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任何具体问题的分析,都需要这种综合性洞察力的引导,当然,这种综合性洞察力的取得本身又依赖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但从逻辑在先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开始一项研究的时候,首先对综合性洞察力进行反思,恰好是使具体研究有一个理论背景引导和衬托的需要,恰好是使研究更加内行的需要,而不是非专业性的“闲谈”。

二、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

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热门话题之一。因为对此问题的探讨隐含的目标诉求是中国哲人多年来的夙愿: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从而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世界哲学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与当今世界一流的哲学比肩而立。因此该探讨是涉及中国哲学发展命脉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其讨论成果也必然引领当今中国哲人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

总体来看,目前大家对此问题的探讨已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是在基本的原则方向上达成了三点共识。从问题域来说,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格局,这种实践格局既包括我国以经济转型为主的社会各方面发生的演变,也包括全球化境遇下人类生存与发展方式的演变。从哲学资源来说,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必须融合“中、西、马”,进而也包括吸收世界上其他地区和民族优秀的哲学精华和智慧。从哲学存在方式来说,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是多元多态的,“多元”是指多种哲学观点、学说、思潮、流派应该共存,“多态”是指多种形态的哲学应该共存,不仅有纯哲学,还应有应用哲学、部门哲学。二是在具体途径方面取得的共识。回到哲学原典中去,深入研读“中、西、马”哲学原典。目前“中、西、马”三个领域的学者都分别开出了非常宏大的细读原典、厘清原典思想的计划。尽管不同的学者开出的规划不同,认定的经典哲学著作及其重要性的程度不同,但细读哲学原典,以此作为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基础性资源这一点是基本相同的。

存在的主要分歧,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融合“中、西、马”。“中、西、马”三“派”都分别想以自我为主融合其他两者,并分别提出许多具体的融合方式。二是新世纪哲学的形态究竟应该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新的哲学形态。对此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构想,有的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真正的哲学大智慧还没有出现,真正可以代表中国新哲学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性理论、作家、作品还没有。

可见,此探讨目前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融合“中、西、马”。是以其中一派、一家,或者其中某种观点、方法为基点来融合,还是超越三家,寻找一种更高的境界?目前大家都意识到融合的必要,但一方面因为要融合本身就博大精深的“中、西、马”哲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学科研究的深厚积累,要“融”首先就要“通”,要通晓“中、西、马”,另一方面因为融合本身也是一种创新,要融合只通晓还不行,还要“贯”,只有用一种东西把许多分离的东西贯穿起来,才会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新东西,所以融合需要哲学的

大智慧,没有哲学的大智慧贯穿不了“中、西、马”。二是如何构建新哲学的内核,体现大智慧,产生可以和西方哲人比肩的理论、作家、作品。构建新哲学的内核与融合“中、西、马”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在这里,笔者试图针对这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谈三点看法。

(一)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融合“中、西、马”

只要承认我们是在建构新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不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那么在学科建构和学术规范日益专业化发展的今天,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就应该回归哲学的真精神,以哲学自身特有的方式思考问题。融合“中、西、马”应该做到: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去实现真正的融合。

1.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

融合不是混合,不是拼凑,融合是要寻找更加广阔的视界和理解空间。如果说“哲学”是一种“思”,那么哲学流派、哲学观点就是“思”之“现存物”。正如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常常只注重存在者,而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却被遗忘了一样,在融合“中、西、马”时,我们也有一种倾向:只关心具体的哲学流派和观点,遗忘了哲学本身,从而把充满智慧活力的哲学实体化为具体形态的哲学,以知识代替智慧,以人类对智慧探索的结晶代替对智慧的探索本身,以具体形态的哲学代替哲学本身。

这种把哲学实体化的倾向导致了两种明显的弊端,一是对中国哲学合法地位的质疑。由于有一些学者把作为哲学之一种的西方哲学作为哲学唯一的“现存物”,或者说真正规范的形态,而质疑与其言说对象、言说方式有较大差异的中国哲学在哲学苑中的存在地位。二是按照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教科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任意批判。我们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不是超越和否定之否定,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否定、批驳。其主要表现是把哲学划分为唯物、唯心两大派,并把这种划分绝对化,

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否定、批驳；按照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定义把哲学分为各阶级哲学，并把哲学和阶级利益直接对应起来，对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哲学进行否定、批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并对它进行否定、批驳。在此我们不是说不应该进行哲学上的唯物和唯心的划分，也不是说不讲哲学的阶级性，而是说我们不能把这种划分绝对化、简单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我们简直只能承认，一种哲学就是它所是的方式。我们无权偏爱一种哲学而不要另一种哲学——有关不同的世界观可能有这种偏爱。”^①

应该说目前学界对这种简单化的批判已有较深入的认识，现在一般也没有人再进行这种简单化的批判了。但由于没有对此进行哲学的反思，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很多学者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一般不去触接这些问题而已。如果说上面所说的是实体化倾向的显性弊端，那么其隐性弊端是：把“中、西、马”哲学的学科划分变成哲学的划界，各自从自己特定的视域去观察对象，从某一角度、某个层面去理解具体的、统一的存在，把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降低为知识形态的哲学。“中、西、马”哲学都是人类文化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晶，是人类“在途中”的一种思考，人类存身于其中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变动着，人类自由的智慧每时每刻都在永不懈怠地探索着，我们不能把人类在某一阶段、某一意义下的探索成果本体化。“中、西、马”作为既成理论，不是封闭和禁锢人们智慧的路障，而是催生新哲学的助产婆，它们应该像干柴一样去触发人类智慧的烈火熊熊燃烧。“思想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规定的思。”^②如此，才能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中、西、马”才能在哲学自身的理念下，都成为哲学的一种财富，都被理解为哲学家园中合法的成员，理解为延续、发展哲学的一种共同资源。只有在此情况下，“中、西、马”哲学之间

①《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3页。

②《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61页。

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和融合。

“中、西、马”哲学对话和融合的意义在于为深入理解某一哲学系统提供一种理论参照。在单一的视域下,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其内在的意蕴都难以充分地敞开和展示,而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一种哲学系统的深刻意义就容易被揭示和把握,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可以扬弃不同哲学传统的理论局限,达到更宽广的理论视野^①。因此,作为哲学发展史上的三种存在物,“中、西、马”的理论地位只有在哲学自身的逻辑中才能被说明。这不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融合过程中的指导地位,而是说只有回到哲学本身,在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中,以哲学本身的逻辑才能找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不是被命定的,不是靠剪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典中的个别词句和段落得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是在哲学自身逻辑中呈现出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特点是其批判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具体路径上,首先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哲学自身,在回归中找出其符合当下时代的真精神,再以此真精神融合“中、西、马”。这样我们就不是把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以此来剪裁各种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种不断生长着的智慧之源,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演变不是一个同质性的连续演变的历史,而是因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多种理论思潮交融形成多中心的分裂对抗与共存的格局。^②各国以自身国情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都有自身的历史理由,各国的社会条件的差异,又决定了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传统和政治立场。因此,任何无批判地认同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为,都可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向歧途。

那么哲学的真精神是什么?哲学自身是什么呢?对此,不同的学

① 杨国荣:《哲学对话:走向内在的视域》,《光明日报》,2004年1月6日。

② 王贵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转型》,《探索》,2004年第5期。

者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哲学是“爱智”之学,它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品性和功能。

一是哲学应澄明现实社会的存在之真。哲学是以“理解”的方式把存在之真带到我们面前。“理解”按中文的意思是把原本“混乱”的东西,“理”“顺”了;把原本“纠葛”在一起的东西“解”“开”来。“理解”就是使原本混沌的东西有序,原来看不清的,使之能看清楚;原来没有规则的,使之有规则。哲学的理解以知识—科学体系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但不是说,一般的经验科学乃是哲学的基础,相反,哲学才是经验科学的基础,它应该为经验科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得以如此存在的根据进行论证和说明。^①作为揭示存在之真的哲学还应该以存在之真来反观时代精神和困惑。哲学之所以能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和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提供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或“思想中的现实”,它应该联系现实、为现实服务,但它又需要与现实“拉开间距”,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丰富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把特定时代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昭示出来,把人类不断引向完满的理想境界。

二是哲学应该为人们提供一种反思后的生存方式。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把澄明了的存在之真、反思后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带入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开显出人性化的境界。一方面哲学应提供一种智慧,使人摆脱“物”一样的机械存在,获得一种自由的、有意义的生存状态,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人自身蕴藏的丰富性完满地展示出来。另一方面,生存着的人类,“有能力死”的人类,带给世界一个“无一不存在”的观念,“楔入—嵌入”铁板一块的现实的必然“大箍”里,使混沌的世界裂口,时间空间化,内在外在化。于是,不仅人有了“始终”,万物莫不有始有终。原本在物质形态持续转换中因之并无自己的万物,有了自己,世间万物以自己的面

① 叶秀山:《哲学的三种境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貌开显出来,成了人文的事物——成了“文物—文化之物—人文之物”。^①哲学还要用反思后的生存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防止人们在流行中迷失自己。

三是哲学应该满足人类的超越性追求,为人们提供价值尺度,促进人格的完善。人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存在,因而是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的存在。一方面哲学应该给人们提供“超越”当下眼前“实用功利”的可能,把自己和外在世界当做一个对象来欣赏,来观察,来研究,使人这个族类“摆脱—暂时摆脱”生活必需,而对世界采取自由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将自己提高到一个自由的境界,也就是人类自己的境界。^②哲学还应该为人们提供一种价值理想和尺度,“转识为智、化性为德”,促进人格的完善。在新的世纪,全球化带来了产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世界性的经济繁荣和财富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犯罪、传染病、污染、贫富分化、道德沦丧和价值失范,等等。鉴于此,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充分发挥其价值导向功能,直面这一系列价值困境,关心人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给予人们理念和理想,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建构生活的价值和理想,把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理想现实。^③

总之,哲学是对智慧的爱,它要为人们提供观察、理解、把握世界(包括人类自己)的方式、方法,它要“观”科学的世界、道德的世界、审美的世界、宗教的世界,要“观”人自身的丰富性、可能性、完满性,要“观”世界的存在之真,并要把这种“观”之结果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楔入—嵌入”铁板一块的现实的必然“大箍”里,使本然的世界逐渐生成为人活动于其间的自由的应然的世界。因此哲学永远“在途中”,每一种既成的哲学都是途中的一个足迹,它的意义和价值都只有在哲学的地平线上才能显现出来。“中、西、马”的对话就是要拓

① 叶秀山:《哲学的三种境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叶秀山:《哲学的三种境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陈名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9卷第1期。

展这一地平线,并使它显明出来。在这一更加广阔的地平线上,“中、西、马”才能找到沟通和融合的平台,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才能生成为平台上一座可以望断古今的高峰。

2. 顺应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

回到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意味着要顺应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顺应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一是要顺应哲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二是特定时代的哲学要体现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哲学研究的重点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不断转移。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是本体论,探求世界是什么。到了近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认识论,探求怎样认识世界,但西方近代哲学却由此走向了思辨形而上学性。现代西方哲学力图超越近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从拒斥“形而上学”转向重建“形而上学”、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由两极对立转向对话和沟通的倾向。^①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又表现出对现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并进一步彰显出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力图超越近代西方哲学,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把生产劳动看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从而引发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的哲学不满足于解释世界,提出了改造世界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形成多中心的分裂对抗与共存的格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探索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的欧洲“新道路”为己任,因而又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来源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但经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已获得丰富和发展。在当代,马克思主

^①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求是》,2002年第2期。